

亟须一种修正思维

——读贝西埃等主编《诗学史》有感

王宁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研究的盛行确实对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按照美国著名的文学史家、《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主编爱莫瑞·爱略特(Emory Elliott)的说法,“诗学”(poetics)也和它的另一同伴“美学”(aesthetics)一样,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几乎被打入了冷宫。^①确实,文学史的写作也在经历了其发展的盛期之后逐渐进入一个相对冷落的“低谷”。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文学研究不甚景气的时候,我竟然有幸读到我的一位老朋友——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前任校长伊娃·库什纳教授参与主编的鸿篇巨制《诗学史》(Histoire des poetiques, 1997)(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我知道,这是由三十多位重要的欧美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学者合作编写的一部相当厚实的文学批评史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国际比较文学界和文学理论界长期以来留下的空白。读完全书之后,我不禁浮想联翩,感触颇多。

回想起九年前应库什纳校长之邀,我有幸前往设在多伦多维多利亚大学的弗莱研究中心作访问研究。当时我和库什纳教授都参与了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持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uropean Languages)的编写工作,我刚刚把为由伯顿斯和佛克马主编的《后现代主义》分卷写的“后现代主义在中国

的接受”一章交稿，而库什纳则忙于那本大部头的《诗学史》的编写工作。这两个项目都是由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下属的文学史委员会主持和协调的，因而在质量上得到了可靠的保证。而该委员会的主席就是时任多伦多大学比较文学中心主任的马里欧·沃代斯教授。这样一来，我们便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一些来自欧美各主要大学的学者，共同讨论切磋这本书的写作策略和方法。可惜后来全书出版后我未能及时读到。现在，读了这本由史忠义博士独自翻译并刚刚出版的中文版，虽感到书中若干人名和术语的译法尚值得商榷，文字上也有不少地方尚有推敲和改进之处，但仍能感到这部巨著的恢宏气势和丰富资料。应该承认，由一位仅主要受过法国文学和理论训练的译者来承担如此重大的翻译任务，确实是空前的。在此我谨向译者表示深深的敬意。

毫无疑问，这本书的知识和信息含量是十分丰富的，正

如译者在后记中所揭示的，这本由多人完成的巨著“上自柏拉图时代起，下迄二十世纪末，涉猎文论作者近两千人，文论作品一千五百余部（篇）。除法语外，文中不时出现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英语、德语、俄语、荷兰语以及奥依语、卡塔卢尼亚语等中世纪方言，带有明显的比较色彩。”^②因此，这本书的比较色彩是十分浓厚的，也是它不同于一般的文学理论史的特色之一。读完全书之后，我感到这本由多人编写的理论史书也存在着写作上的不平衡性。例如，作为其中厚古薄今的特征之一，古代、中世纪、十八世纪以及浪漫主义文论部分都写得比较精彩，并对以往研究中的一些失误提出了批评意见，而在相对薄弱的二十世纪部分中，则明显暴露出写作上的不平衡性。当然，形式主义、新批评、接受美学以及巴赫金等章节确实写得比较精彩，明显能看出各位作者在这方面的精深造诣和深入研究，而对一些与当代非

“诗学”或“非审美”的理论思潮，如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权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学批评、解构批评、文化研究等，则草草带过，缺少深入的实质性论述。而上述这些则恰恰是当代文化批评领域内的学者异常重视的理论现象。此外，作为一部主要由欧洲的精英学者合作的研究成果，本书也存在着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不仅对东方诗学极少提及，另一方面，即使对进入二十世纪以来越来越显得重要的美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也论述过少。这与当今的美国批评理论界在西方学术界内实际上所处于的“中心地位”显然不相符合。因此，严格说来，本书的书名应当加上一个限定词“西方”或“欧美”才能准确地反映从古到今的诗学发展的面貌。当然，作为一位东方的文学理论研究者，我从书中获得的倒不仅仅是一些知识和信息，而更是对文学史写作、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构等问题的进一步思

考之启示。下面我想就后两个问题展开评述。

二十世纪初以来，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崛起，文学研究领域经历了一系列的理论思潮冲击，但文学史始终在各种理论思潮的冲击之后占有重要的一席。文学理论史的写作也和文学史的写作一样，经历了从解释文本到解释理论和解释已有的“解释”的转折。在这方面，实际上体现出了其不断“修正”、不断“重构”文学或理论“经典”的过程。对于这种修正的意义，曾先后介入新批评和解构批评的美国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有着较为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在文学史上，每一位强者诗人都力图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才能去误读自己的前辈大师，因而他们的每一首诗似乎都经过了“修正”的各个阶段，而每一阶段都可显示出这种修正的程度。针对所谓的“误读”与创新之关系，他争辩道，自从密尔顿创作了《失乐园》等不朽的诗篇以来，诗人们仿佛都

经受着一种“迟到”(belatedness)意识的折磨:由于自己在诗歌史上姗姗来迟而害怕前辈诗歌大师们早已把“灵感”使用得差不多了。为了适应这种迟到的写作,诗人们必须与自己的前辈大师进行殊死的搏斗,以便进入心灵世界,努力发掘,创造出富于想像力的独特空间。

在《影响的焦虑》中,布鲁姆通过厚今薄古的“修正”策略,发展了一种“对抗式”(antithetical criticism)的批评。这种批评模式的特征体现在他创造性地将弗洛伊德的“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说运用于文学批评中。也即前辈诗人犹如一个巨大的父亲般的传统,这一传统无时无刻不给后人带来无法超越的巨大阴影,使后来者始终有一种“迟到”的感觉,因为当代人的每一个创造性活动似乎都已经被前人做过了,因而为了超越这种传统的阴影,当代的强者诗人惟一可采取的策略就是对前人

的成果进行某种“修正”或创造性“误读”。当然,这种创造性误读是建立在对前辈有着充分理解之基础上的,因而其结果便导致某种程度的创新。他还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六种“修正比”: (1)“克里纳门”(clinamen),即真正的诗的误读或有意的误读;(2)“苔瑟拉”(tessera),即“续完和对偶”; (3)“克诺西斯”(kenosis),即一种旨在打破与前驱的连续的运动;(4)“魔鬼化”(daemonization),即朝向个人化了的“逆崇高”的运动;(5)“阿斯克西斯”(askesis),即一种旨在达到孤独状态的自我净化运动;(6)“阿·波弗里达斯”(apophrades),或“死者的回归”。^③这六种“修正比”的提出为他后来的系统性反传统“修正式”批评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

毫无疑问,坚持文学批评的个人色彩和个性特征是布鲁姆修正式批评的一个主旨,这一点始终贯穿于他的批评生涯。但是另一方面,在尼采的权力意志和弗洛伊德的俄

狄浦斯情结说的影响和启迪下,“布鲁姆通过将诗的想像和阐释力量非个人化”,从而可以说最终“建构了一种批评的媒介,通过这种媒介,想像可以与最原始的独创性冲动相一致,也即达到一种把握真实的意志。”^④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对经典的构成和重构的一系列论述中。

尽管布鲁姆对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有着一种天然的敌对情绪,但他的修正主义理论之于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意义仍体现在,他对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构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这种“去经典化”(decanonization)的尝试与文化研究者的实践实际上有着共通之处。在十分畅销的《西方的经典》一书中,布鲁姆站在传统派的立场表达了对当前颇为流行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极大不满,对经典的内涵及内容做了新的调整,对其固有的美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作了辩护。针对经典(canon)这一术语所含有的文学和宗教之双重涵义,他首先

指出:“我们一旦把经典看作为单个读者和作者与所写下的作品中留存下来的那部分的关系,并忘记它只是应该研究的一些书目,那么经典就会被看作与作为记忆的文学艺术相等同,而非与经典的宗教意义相认同。”也就是说,照他看来,文学经典是由历代作家写下的作品中的最优秀部分所组成的,这样一来,经典也就“成了在那些为了留存于世而相互竞争的作品中所做的一个选择,不管你把这种选择解释为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团体、教育机构、批评传统做出的,还是像我认为的那样,由那些感到自己也受到特定的前辈作家选择的后来者作出的”。^⑤因而写下这些经典作品的作家也就成了经典作家。显然,他的这些论述对关于文学经典的构成以及隐于其背后的权力运作之作用的讨论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另一位十分关注经典构成和重构的理论家当推在国际比较文学界享有崇高威望

的荷兰学者杜威·佛克马。他精通几乎所有的欧洲主要语言，并能用中文和俄文阅读，用英、法、德、荷四种文字写作，近年来尤其对中国文学颇为关注。他对文学经典的构成的论述首先体现在他对西方文化思想史上由来已久的“文化相对主义”的重新阐释，这无疑为他的经典重构实践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在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领域，佛克马是最早将文化相对主义进行改造后引入研究者视野的西方学者之一。在理论上，他认为，“文化相对主义并非一种研究方法，更谈不上是一种理论了”，但是“承认文化的相对性与早先所声称的欧洲文明之优越性相比显然已迈出了一大步”。^⑥在实践上，他率先打破了国际比较文学界久已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传统，主张邀请中国学者加入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并担任重要职务；在他主持的《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uropean

Languages) 的后现代主义分卷《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文学实践》的写作方面，他照样率先邀请中国学者参加撰写，因而使得一部用英文撰写的比较文学史的分卷第一次有了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描述。^⑦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史撰写的一个突破，同样，这对我们重新审视既定的经典之构成也不无启迪意义。可惜，《诗学史》的编者并没有意识到突破“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重要性。

经过一番理论上的争论，文化相对主义的本来内涵发生了变化。照我们现在的理解，文化相对主义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的，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着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

存。有了这种开放的文化观念，对有着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文学经典提出质疑乃至重构就顺理成章了。佛克马和夫人蚁布思在一本近著中对“谁的经典”、“何种层次上的经典”等问题也提出了质疑后，并大量引证了中国文学的例子，颇有洞见地指出：“我们可以回想起，中国也有着经典构成的传统，这一点至少也可以像欧洲传统那样表明其强烈的经典化过程之意识。”^⑧而令人遗憾的是，像佛克马这样有着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和知识的西方学者实在是凤毛麟角，因而在长期的文学和文学理论撰史实践中，不少西方学者不是出于无知便是有意识地忽略中国文学和诗学传统的存在。而佛克马等西方有识之士的努力则为中国文学价值为更多的人所认识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由此可见，在确立文学和理论经典方面，不仅有权力的运作机制在起作用，而且还有撰史者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欧洲中心”和“西方中心”意识在

作祟。我们在认可本书的重要学术和理论价值之同时，也期待着未来的修改者会对此有所认识，并对之作出相应的修正。因为不仅文学的发展是一种不断修正的实践，即使诗学的发展也难以摆脱修正的思维模式。

注释：

①参见爱莫瑞·爱略特 2001 年 11 月 5 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美学》(Aesthetics in the Multicultural Conte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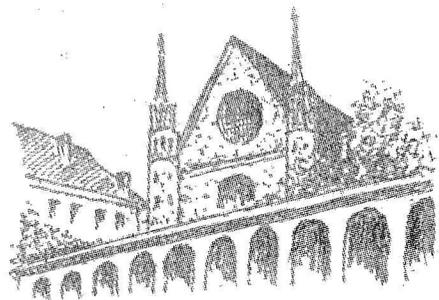
②让·贝西埃等主编，《诗学史》，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跋”，第 892 页。

③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3 年版；中译本见徐文博译，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13—14 页。

④参见迈克尔·格罗登和马丁·克莱斯沃斯编，《约翰·霍普金斯文学理论批评指南》(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巴尔的摩和伦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96 页。

⑤布鲁姆，《西方的经典：各时代的书籍

<p>和流派》(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纽约: 哈考特·布拉斯公司, 1994年版, 第17-18页。</p> <p>⑥杜威·佛克马, 《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论集》(Issues in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加尔各答, 1987年版, 第1页。</p> <p>⑦参见伯顿斯和佛克马编, 《国际后现代主义: 理论和文学实践》</p>	<p>(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 阿姆斯特丹/费城: 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 1997年版。</p> <p>⑧佛克马和蚁布思, 《知识和参与: 对文学研究的问题性探讨》(Knowledge and Commitment: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to Literary Studies), 阿姆斯特丹/费城: 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 2000年版, 第40页。</p>
--	---



• 书讯 •

跨文化研究丛书 “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即将出版

本丛书系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院与南京大学合作项目, 并被列入国家“十五重点图书规划”。丛书将于2002年8月起由宁夏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

丛书由季羨林、王元化、汤一介、乐黛云、川本皓嗣(日)、佛克马(荷)、叶维廉(美)、程抱一(法)、李福清(俄)任学术顾问。南京大学钱林森教授任丛书主编。

丛书共八卷:

第1卷《佳酿与块垒——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

主要撰稿人钱林森,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2卷《梅红樱粉——日本作家与中国文化》

主要撰稿人王晓平,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天津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第3卷《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

主要撰稿人葛贵录, 副教授, 南京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候选人。

第4卷《鹰踞龙盘——德国作家与中国文化》

主要撰稿人卫茂平,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 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5卷《跨越太平洋的彩虹——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

主要撰稿人张弘,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6卷《悠远的回声——俄罗斯作家与中国文化》

主要撰稿人汪介之, 中国俄罗斯文学学会理事,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建华,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7卷《神奇的想像——南北欧作家与中国文化》

主要撰稿人王宁,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8卷《丝路驿花——阿拉伯作家与中国文化》

主要撰稿人孟昭毅,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师范大学文学学院院长、教授。

丛书总字数240余万字。